
“写作的自觉”与“自觉的写作”

——对 90 年代以来重庆青年诗人诗歌写作的一种阅读

秦 敬¹

(长江师范学院中文系, 重庆 408100)

【摘要】在 90 年代以来诗歌“边缘化”加剧的处境之下,在重庆新诗理论界“新诗二次革命”理念、“三大重建”方向的推动下,重庆新诗在艰难跋涉中迸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一大批 60 年代出生的诗人如李元胜、冉冉、冉仲景、唐力、王顺彬、李尚朝、冬婴等的诗歌创作,以“写作的自觉”(即诗人在诗歌的美学趣味、语言和文体意识等诸方面的自觉)和“自觉的写作”(即在写作之先即已趋向完成的诗人对自我的精神定位与价值确认的写作)而各具特色、引人注目。

【关键词】重庆青年诗人;写作的自觉;自觉的写作;个人化

【中图分类号】I2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6X(2007)06-0055-04

纵观 20 世纪的中国新诗史,重庆无疑已经树立起了它在全国的重要影响和地位。古老的巴渝大地以大江环绕、山峦叠翠的独特地理风貌和几千年悠久的文化遗存哺育了众多著名的本土诗人,如吴芳吉、何其芳、方敬、杨吉甫、梁上泉、沙鸥、李钢、傅天琳等,也曾吸引了大批外地诗人在这里挥洒诗情,提升了重庆在全国诗歌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如郭沫若、臧克家、冰心、卞之琳、艾青、胡风、绿原、唐祈、余光中等。如果说,重庆新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是由抗战时期汇聚于陪都的外地诗人充任主角,那么,发生于新时期的重庆新诗的第二次高潮则完全由重庆本土诗人所推动和造就。

在第二次高潮中,从诗人队伍的组成来看,可以说是新老诗人齐声歌唱、同放异彩。方敬、梁上泉、穆仁、吕亮等纷纷“归来”,重拾诗心;而傅天琳、李钢、梁平、华万里、毛翰等更以实力雄厚、风格多样在新时期诗歌界占据了不容小觑的地位。从诗歌理论来看,以“求实、创新、多元”为其基本风貌的“上园派”以它“企图超越崛起派和传统派各自偏颇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主张而促成了诗歌理论“从北向南”的再次转移。以 1986 年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成立为标志,重庆的新诗研究也成了新时期中国诗学研究的重镇。一批中青年诗歌评论家如陈本益、周晓风、蒋登科、李怡、王毅等显示出雄厚的发展实力,而吕进主编的煌煌 50 余万言的《20 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的出现,更以他完整而科学的诗学体系的建构、对一系列重大诗学命题的阐释填补了诗学研究领域的空白。“新诗二次革命”的理念、“三大重建”的方向,在 90 年代文学“边缘化”处境之下尤其具有建设性价值和里程碑似的意义^[1]。而除了历史积淀与传承以及中国诗歌普遍遭遇的“边缘化”处境以外,90 年代的重庆新诗发展也迎来了它的机遇和挑战:举世瞩目的三峡移民工程和 1997 年重庆继北京、上海、天津后成为第四个直辖。

重庆新诗在艰难跋涉中迸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其中,一大批 60 年代出生的诗人如李元胜、欧阳斌、杨矿、唐诗、唐力、李海洲、王顺彬、李尚朝、冬婴以及少数民族诗人冉仲景、冉冉等的诗歌创作,也以自觉的个人化写作、对诗歌精神价值的坚信、对自我的精神定位与价值确认的韧性探索而引人注目。

¹收稿日期:2007-09-25

作者简介:秦敬(1968-),女,重庆丰都人,长江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一、写作的自觉

在朦胧诗后的当代诗歌的整体格局中,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无疑是一支核心力量。无论是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那场轰轰烈烈、喧嚣热闹的第三代诗歌运动,还是在社会转型后突遇“边缘化”处境而沉寂的1990年代,他们都以鲜明的个人化特征和坚实的写作实绩充任着主要的角色。如果说,朦胧诗一代因为其在社会意识形态上唤起了人的自觉而呈现出意识形态对抗式写作的特征的话,那么,这一代人则是以其对朦胧诗在文学层面上的“文学的自觉”的继承和发展为其“代际”特征的。与朦胧诗人基于对人性复归的呼唤与人道主义立场的重新发现而强烈呼求的“大写的人”的愿望不同,这一代人普遍关心人的自我意识。

人的自我意识被发现的前提,在北岛那里首先必须附着于一种明确的社会关系、混成于某种庞大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然后它才有可能被认识到并逐渐被剥离,它尚不足以自明。而在这一代人中,“自我意识”就是自我意识本身,是“个人化”的基础,而“个人化”是他们从事诗歌写作的前提,它早已无需辨明而只待写作者去创造和完成。经由这一代人的努力,肇始于朦胧诗的“人的自觉化”与“文学的自觉化”运动,演变成了一场推动当代诗歌多元化发展与又朝向自身不断生发与深化的文学的个人化进程。

可以说,中国诗人从未像这一代人那样强烈关注自我意识和“个人化”之于写作的意义。诚如韩东所言:“只有作为人的真实的东西才是我们追求的对象——人在艺术中具有无可比的意义。作为人的真实是永恒的。”^[2]作为新诗研究整体格局中的西南版图,1960年代出生的重庆诗人也大抵具备上述特征。笔者把诗歌写作中的这种“自我意识”或“个人化”特征称之为“写作的自觉”,它体现为诗人在诗歌的美学趣味、语言和文体意识等诸方面的自觉。

李元胜曾这样描述他写作的“出发点”和诗人的“使命”：“写作是我安排给自己的一项悄无声息的工作……”而诗歌是“全然面对个人的工作所产生的结果”。诗歌既是一种纯粹自发的行为,诗歌美学品质的获得当然就得依赖于诗人的个性,诗人就得“逐渐学会发挥出自己的最高天赋”。李元胜的诗歌从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而又对之进行挑剔的检视,“经验”能否作为材料进入写作、从写作的最后效果来省察其是否有用,取决于“经验”所提供的现实性与诗歌语言的可能性是否相与“呈现”的过程中,“诗人必须对事物及事物之间的关系保持独立的判断”并关注、相信自己的经验^[3]。

正是怀抱对“诗歌是一个种族的触须”的自信和努力抵达“诗意地栖居”的高度,李元胜以一种智性的写作消弭了个人经验与技艺和普遍性之间的齟齬,使“经验”服膺于诗人天赋的写作才能的优雅控制而达到一种他人难以驾驭的精巧的平衡,并以此承载诗人对生命本真状态的不断探寻、追慕。他的诗歌美学趣味总的来说介于现代与古典之间并更倾向于古典,比如对语言质地的打磨、对感伤和滥情的警惕、对节制之美的深刻感悟等。

“写作的自觉”在土家族女诗人冉冉那里表现为对自己的诗歌语言的清醒体认:“我希望我所写就的文字像镜子一样简单、透明、直接,同时也希望这简单与透明的后面连带着黑暗般广大厚实的真实存在。”^[4]无论是对特定地域自然风貌、风土民情的描摹,对个人情感世界的真切吟咏,还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深入探寻,亦或对本民族文化传统与土家族底层民众生存的深切关怀,冉冉都以“朝向自身的世界”为其写作理念,呈现出一种“沉思的把握”式的写作姿态^[5]。

“个人化”在她那里突出地表现为简洁明快、口语化的语言,谣曲似的复沓与回环的风格,“卧在山腰的!是我的羊!趟水而来的!是我的羊”(《送羊》),“哪处的梨花!暗夜的梨花!哪里的暗夜!眼睛的暗夜!哪里的眼睛!土地的眼睛”(《暗处的梨花》),又如“有家归不得有力无处使!我的兄弟犹如地皮历经风雨!劳顿而疲乏犹如牲口!迁徙又迁徙”(《我的兄弟》)。

然而这只是她的文本可辨识的脆弱的标记,她的写作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探寻外部世界的疆域是否深广,而在于她以个体的生命意识朝人类的普遍性的经验掘进的深广,在于她用语言之笔把一个内化了的自我从社会身份、无意识、性别等剥离并呈现出来的程度。那也许才是一个诗人最强大最可依恃的“个人化”标记。

而在冉仲景的诗歌中,对雪域高原和土家山寨的和弦式的深情吟颂是其主要的审美对象。他的“写作的自觉”体现在题材和抒情方式上对异质经验的统摄,不论是“并非另类人生”(阿来语)的康巴人的生活和风俗人情,还是对故土亲人的缅怀与沉思,都是作为“材料”而不是作为诗歌发动和反射的现实语境被诗人的个人经验所吸纳,经由“从朗诵到吹奏”、“从独奏到和弦”的探索历程,形成了自由体式无韵又自有内在韵律的完全个人化的语调。

二、自觉的写作

所谓“自觉的写作”,笔者认为是一种在写作之先即已趋向完成的诗人对自我的精神定位与价值确认的写作。诚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完成”是相对的、几经踌躇的、不断自我拆解又顽强重建的。这么说,“自觉的写作”又似可称为“有方向感的写作”。“你想写出一个世界,首先在‘精神向度’上要厘定好它的方向”^[6]具体到某个具体的诗歌写作行为,“自觉的写作”又可以在“诗之为诗”的个人化表达、有效地介入时代生存和生命以获取“当代性”、对现代汉语的开放性与可能性的挖掘等方面予以观照和讨论。

冬婴,是一位从日常生活经验的围困中潜心捕捉纯粹而素朴的诗意的诗人。“写作的自觉”于他而言就是“诗,小于诗意大于一切”的诗观,他认为“诗具有一定程度的先验性,诗源于对生命和生活的原初体验和超常感觉,源于对杂乱世态深处那个诗化焦点的无限接近,源于对诗的敬畏和向往之间的一种虔诚的试探。”^[7]这已是一种较为成熟的诗观,它涉及到诗歌的本质、发生、价值以及诗人的写作态度问题。冬婴被有论者定位为“乡土诗人”,可能是依据他的那些受人喜爱的“农事”诗中频繁使用了“父亲”、“母亲”、“家门”、“炊烟”、“农具”等意象。

然而笔者认为冬婴的“农事”诗既不同于文人遣兴式的山水田园诗,也不等同于那些面似孤傲而内忧庙堂的隐逸诗,简单地认为那些意象是诗人精心构筑的与“现实”相对抗的精神乌托邦的读法是不可取的。“在某个特定时代,一系列核心语象成为诗人反复涉入的元素或原型,是诗歌内部机制自动性的反应。

因此,不存在如何人为抑制它们的问题,而只存在如何通过个人的生命经验来加深或改写它们当代内涵的问题。”^[8]冬婴的“农事”诗中的那些意象某种程度上已经被诗人剥离出了社会现实语境,还原为人类语言诞生之初的基本语词,它们在被人类的声音读出的同时即指认其自身。它们是诗人返归自身生命的路途,是诗人辨认自身生命底色的掌纹和脚印。因此,它们在诗歌中带有“基因”的性质。凭着对“基因”的笃定,“诗人之为诗人”对冬婴来说就有“行得通”、“踩得住”的一份自信和骄傲。

这种“基因”式的写作决不依赖于某种社会现实语境,而是语言不断探测事物的内里与边界的行动,它朝向现实敞开又不断地返归自身,它真切地进入现实然而于现实又毫不粘滞。因为诗人坚持认为,诗歌的最高也是最素朴的一个真理即是诗意的获得,而这诗意就是生命的底色(或如冉冉所言“简单、透明的镜子后面连带着的黑暗般广大厚实的真实存在”)以及生命最深邃最隐蔽的那个质核。当然也可以说目前冬婴正面临着一个“资源开掘程度”的问题,“接轨”与“气魄”的问题^[9],

但这问题不如换一种说法更具开放性:当诗人摆脱了对所有现成的社会现实语境的反射和投影,挣脱了一切凝固而“安全”的意识形态诱惑之后,当他们向虚无宣战时除了一个轮廓清晰但尚需完成和充实的“自我”而外无可依傍时,善意地提醒他们不要拒绝更广阔的“现实”材料的进入,也许不如鼓励他们不要用草率的“超越”和“接纳”把真正的问题悬置和架空更具建设性。因为真正的面对应该是从“到手的材料”的便利、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的。

而“建设性”在王顺彬和唐力那里则很明显地呈现出一种坚持个人化的诗学追求与有力地介入现实材料之间的顺向发展关系。在王顺彬的组诗《仿佛有什么巨大的声响》(发表于《诗刊》2005年第12期)中,他容纳了诸如“汽修工”“民工”“哀乐”“卖水果的女人”甚至“蚂蚁”“鱼”“刀豆”等琐碎日常的“现实”材料,而同期发表的唐力的组诗《大地上的人和事》则在对现实生活的个别现象和琐碎细节的描写中发现生命的悲悯与沉痛、触摸事物的内在的真实。

诗人并不囿于时代的“噬心主题”（陈超语）对诗歌提出的道义上的要求而忙于对表象碎片的被动追逐，而是出于一种语言本体论意义上的“介入”。对诗人来说任何现实之所以是一种可感知并可被言说的“现实”，恰在于它们生存于诗人的独特的文本构成中，被诗人的想象力所唤起，被一颗诗心所烛照。

“现实”固然可能改变诗人的内心图景，但“现实”也更可能在精神和象征的意义上被每一个诗人个人化的创造所改变。现实是“无边”的，也是变动不居的，它并不外在于诗人并对他们构成一个充满敌意的静止的客体。它与诗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静观”式的相互打量而是一种双向交流的对话与相互建设的关系。

一种更加直观可感的零散的“现实”呈现在李尚朝的诗歌中，被诗人的诗歌信念所统摄。在重庆这个盛产“棒棒军”、火锅以及美女的地方，读者时常会被其诗歌中的人间烟火气甚至狡黠的顽童般的幽默所感染。但其实诗人从未丧失过对人类精神力量的坚信，对一种力，一种人性即使是在最黑暗、最艰难的处境下仍能焕发出它自身永恒向上牵引的力的坚信。“最后的力量和智慧，尽力倾注！让阳光来到山头，晨光闪现！世界的黑暗退得远远”（《朝圣的雪》）。他的诗歌写作呈现出一种颇具巴曼子精神的机变的不拘囿于某种现成体系的向世界敞开的行动能力。

北岛在谈及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朦胧诗人的“文化”角色时曾说“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10]。这说明“自觉的写作”亦即写作之先已几近完成的诗人对自我的精神定位与价值确认难免“错位”。

那么在今天，当90年代初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已趋向立体和深层，社会的急剧分化和渐趋定型带来了新的民生问题，如底层民众生活的贫困化和新的现实秩序导致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公，促使人们普遍加强了对诗歌道义力量的呼唤，而诗人们却仍沉迷、流连于那个刚被发现不久的“自我”，搁置他们天然具有的紧张性与批判性，拒斥更广阔的现实社会场景的进入，是否也是一种“错位”呢？或者，出于一种可理解的对诗歌处境的越来越边缘化的焦虑而急于给“世界厘定一个方向”、随社会的潮起潮落而沉浮的即时性写作行为，又可能导致另一种“错位”呢？说到底，真正的诗人，是那些敢于坐进任何时代的黑暗深处、敢于刺穿任何命名的虚无核心的人。他深知，假如诗歌是一种信仰的话，那这信仰就是一种既无上帝也无天堂的、无人见证的、断非一劳永逸的信仰，诗人仅仅“信靠”还远远不够。因此他既要敢于承载病态与邪恶，又要不羞于向光明和美好俯下头颅敞开胸怀，与此同时他还得警惕任何形式的劝诱和利用。从这个角度来说，真正意义上的“自觉的写作”显然永远处于趋近和建设之中。

值得乐观的一个事实是，时至今日，重庆的青年诗人们仍在认真而努力地探索着。这个名单可以开列得很长，除了笔者由于个人才能、资料搜集及篇幅等的有限而勉力涉及到的几位以外，至少还应该包括欧阳斌、李海洲、杨矿、唐诗、何房子、向阳以及更年轻的雨馨、沈利等。

那么，作为读者的我们，是否也应该给予他们以足够的耐心和真诚的期待呢？答案是肯定的。

参考文献

[1] 吕进. 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4.

[2] 西渡. 时代的弃婴与缪斯的宠儿——试论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J]. 江汉大学学报, 2005, (5): 29.

[3] 李元胜. 重庆生活[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3. 201、202、203.

[4] 冉冉. 对镜写作[J].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2002(3): 36.

[5] 易光. 朝向自身的世界——冉冉诗歌创作论[J].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2002(3):22-26. [6][8] 陈超. 中国先锋诗歌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48、29.

[7][8] 冬婴. 低处的声音[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7. 263-287、261.

[9] 北岛. 失败之书[M].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4. 168.